



学术顾问：王忠祥
项目主持：邹建军
编 选：王远年

易卜生诗歌研究

Studies on Henrik Ibsen's Poems

雅园出版公司

易卜生诗歌研究

Studies on Henrik Ibsen's Poems

学术顾问:王忠祥

项目主持:邹建军

编 选:王远年

Advisor: Wang Zhongxiang

Project Designer: Zou Jianjun

Compiler: Wang Yuannian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惠存

邹建军

2008年8月

雅园出版公司

Yayuan Publishing Company

Hong Kong June 2006

书 名:易卜生诗歌研究
Studies on Henrik Ibsen's Poems

编 者 王远年
责任编辑 黄一田
封面设计 肖群华

出 版 雅园出版公司
发 行 雅园出版公司
地 址 香港九龙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 2—1003 号
登记号码 21368350-000-12-97-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5 14.4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13.8 元

ISBN 962-986-094-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易卜生研究的新领域	王忠祥(1)
第一章	对世界的主观抒情:易卜生诗歌鉴赏	王忠祥(5)
第二章	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	邹建军(15)
第三章	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	邹建军(34)
第四章	易卜生诗歌的人文情怀	李志艳(53)
第五章	易卜生早期诗歌的主题	罗良功(63)
第六章	易卜生诗歌的民谣倾向	王远年(76)
第七章	易卜生诗歌中的上帝及其相关意象	谭 永(89)
第八章	易卜生诗歌的戏剧性	白英丽(99)
第九章	易卜生诗歌的悲剧精神	吴海超(110)
第十章	易卜生诗歌的寓言性	胡艳萍(121)
第十一章	易卜生诗歌的叙事艺术	张 廉(130)
第十二章	易卜生诗歌的童话色彩	王远年(142)
编后记	易卜生作为诗人的意义	王远年(153)

Contents

Preface: New Domain of Ibsen Studies	Wang Zhongxiang(1)
I The Ly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bsen's Poems ...	Wang Zhongxiang(5)
II The Ethical Themes of Ibsen's Poems	Zou Jianjun(15)
III The Political Complex in Ibsen's Poems	Zou Jianjun(34)
IV Ibsen's Human Feelings in His Poems	Li Zhiyan(53)
V The Themes of Herik Ibsen's Early Poems	Luo Lianggong(63)
VI The Balladry Tendency in Ibsen's Poems	Wang Yuannian(76)
VII The Images of and about God in Ibsen's Poems	Tan Yong(89)
VIII The Dramatic Quality of Ibsen's Poems	Bai Yingli(99)
IX The Tragic Essence in Ibsen's Poems	Wu Haichao(110)
X The Allegorical Quality of Ibsen's Poems	Hu Yanping(121)
XI The Narrative Art of Ibsen's Poems	Zhang Lian(130)
XII Fairy-tale Flavor in Ibsen's Poems	Wang Yuannian(142)
Afterword: Significance of Ibsen as a Poet	Wang Yuannian(153)

序言：易卜生研究的新领域

19 世纪挪威杰出的诗人、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在世界文坛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走过了从民族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之父”的光辉历程。早在 1891 年,挪威诗人克努特·哈姆生(192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就说过,使挪威文学“跻于世界文学之林,易卜生的功劳,比任何人都大”(《文学讲演录》)。丹麦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也曾强调指出,“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他的声誉堪称全球声誉”(《易卜生论》)。易卜生确实是一位使挪威人、斯堪底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他的丰富绚丽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异彩纷呈的各类型戏剧,还有颇富远见卓识的书信、文艺散文等,可以说组合成为一部翔实生动的“巨人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挪威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质而言之,易卜生诗化了、戏剧化了他的时代精神。

提起易卜生,世界文学园地和世界文学论坛最关注的是这位戏剧大师和“伟大的问号”的剧作,他改变了欧洲戏剧发展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易卜生及其剧作的学习与研究很广泛,著述丰富,方法和论断迥然互异。易卜生戏剧中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段,以及人物内心刻画技巧,早已引起西方作家、戏剧家的重视,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此后欧美象征主义戏剧、心理戏剧有显著的影响。许多不同流派的剧作家,如瑞典的斯特林堡、英国的肖伯纳、德国的霍普特曼、美国的奥尼尔等,无不把易卜生当作自己的“导师”,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与易卜生戏剧发生共鸣的东西。这里举证奥尼尔的《毛猿》,“毛猿”扬克的象征,与易卜生笔下的“野鸭”(《野鸭》)、“白马”(《罗斯莫庄》)的象征一样,也是有意意识的,突出了人物内心真实与戏剧主题思想。难怪瑞典文学评论家马丁·拉姆指出:“易卜生是戏剧史上的罗马,条条大道出自易卜生,条条大道又通向易卜生。”^①

比较而言,易卜生的诗歌的影响,不如易卜生戏剧的影响那么广泛

而深远。究其原因,勃兰兑斯认为诗人易卜生由诗歌、诗剧创作转向散文剧创作中,“杀害了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意在惋惜易卜生在创作转向过程中损害了诗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1871年出版的《亨利克·易卜生诗集》中,易卜生的许多早期诗作不仅显示了诗才,而且从这里还可辨识其后期作品中的“剧才”。英国当代评论家布莱德鲁克的专著《挪威人易卜生:一个重新评价》(1948)的意见,可以采信:“易卜生作为诗人的魔力逐渐凝聚、集中、完整起来,发展成为一种力量,后来竟尔采用散文剧作为他表达的工具了。”^②此书对易卜生的诗歌进行了专题研究,颇有独创性。关于易卜生诗作与剧作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诗中剧和剧中诗的彼此关照、相互呼应,我在《读易卜生诗作札记》一文中已作较翔实的论证,此处不予赘述。^③法国当代戏剧评论家格拉维耶在《易卜生的戏剧和叙事谣曲》一文中,以《罗斯莫庄》与《海上夫人》为主例,论证了易卜生的戏剧和北欧叙事歌谣的亲缘关系。依他之见,如果把易卜生戏剧“逐部加以浏览(首先是《恋爱的喜剧》)”,不难发现其承受民间叙事谣曲影响的印迹,尤其是“把人物和情侣分成河泽之国和山地之国两类”,这显然有极大的启发作用。^④不言而喻,易卜生的早期诗作以及后来的剧中诗,与民间歌谣也有不解之缘。由是观之,读解和研讨易卜生的戏剧不可不探究易卜生的早期诗作,也不可探究民间歌谣对诗人、剧作家的良好影响。诗人易卜生和戏剧大师易卜生是统一的整体,不能为了突出后者而淡化甚至忘却前者。

作为戏剧大师,易卜生其人其作被介绍到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介绍很早,上演很多,影响很大。广大读者和观众极其重视这位超级戏剧家的创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演出、评介的史迹。他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如浪漫主义剧、现实主义剧、象征主义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易卜生的戏剧文学创作,与我国现代小说、戏剧的关系,抑或我国作家对易卜生剧作的接受,还有独特的“易卜生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成为许多研究者进行比较性探索的饶有兴味的课题。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探赜钩深的论著。但遗憾的是,诗人易卜生研究在中国尚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严格意义上讲,易卜生诗歌研究专论实属罕见。几次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剧作家易卜生的研究,成绩斐然;未见易卜生诗歌研究专论,却也令人有缺憾之感,似可这么认为:系统而深入的易卜生诗歌研究,在我国仍处在科研的“无人区”。2004年1月,我在接受《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记者“访谈”时指出,“我国的易卜生研究还存在亟待补上的‘空白点’,比如易卜生诗歌的系统研究(包括‘诗中剧’与‘剧中诗’)就是‘弱项’,甚至是‘缺项’;关于易卜生文学创作与北欧叙事谣曲的研究,那就更谈不上了。”^⑤此前,我曾参加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领导的“九五”“十五”外国文学学科调查组工作,负责英语文学和北欧文学方面的调研任务,在撰写呈交“调查组”的《北欧文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的汇报材料中,也思考过我国易卜生研究中的缺憾——诗歌研究。多年来,我以及与我有关识的读者、学者一直企盼中国出现一部系统评析易卜生诗歌的著作或文集。现在,邹建军教授主持、策划并精心指导,王远年同志花费大气力编选的《易卜生诗歌研究》摆在读者面前了。它体现了诗人易卜生的“东方知音”的爱心,它使我们如愿以偿。

《易卜生诗歌研究》的执笔人,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一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他们依据总体计划中的撰写原则和要求,分头进行写作;各篇易卜生诗歌专论均建立在较充分调研和把握易卜生思想、艺术特性的基础上。全书十二章有其形式关照和内在逻辑,自成体系,凸显了易卜生诗歌与民间叙事谣曲以及戏剧的亲缘关系,其中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宏观评述与微观探索相结合,理论研讨与个案评析彼此呼应。从易卜生诗歌“对世界主观抒情”的探索,到叙事艺术的求证;从易卜生诗歌伦理主题、人文情怀、政治情结的论述到灵与肉的冲突——和谐内容的评析;从易卜生诗歌中的上帝及其有关意象的辨识到其中戏剧性、寓言性、悲剧精神的研讨;均不乏新的创意和深远的见地。

《易卜生诗歌研究》可能不是十全十美的,理论探讨与个案评析还可向纵深扩展。但无可讳言,这是良好的开端。它填补了我国易卜生研究的空白,开拓了我国易卜生研究的新领域。祈望它能引起学界的

关注和评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对我国建立与国际易卜生研究接轨的“中国易卜生学”有所助益。

注解【Notes】

- ① 参见《易卜生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4。
- ② 参见布莱德鲁克:“诗人易卜生”(节选自专著第二章),载《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274。
- ③ 此文原刊发于《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现经过校订,略予增补,改题为《对世界的主观抒情:易卜生诗歌鉴赏》,收入本文集。
- ④ 参见莫里斯·格拉维耶:“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和民间叙事谣曲”,载《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04。
- ⑤ 参见杜娟:“易卜生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王忠祥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王忠祥

2006年6月15-16日

第一章 对世界的主观抒情:易卜生诗歌鉴赏

王忠祥

内容提要:易卜生的创作道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道路相似,从抒情诗人走向戏剧大师。他的早期抒情诗以及诗剧,都表现了诗人卓越的诗才。易卜生创作中后期的散文剧中,也不乏瑰丽、纯真的诗行,而且这些剧中诗抒情色彩浓重。易卜生把他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包括剧中诗),当作自己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的“实录”,当作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片断。他的诗歌所涵蕴的浓烈的历史感与哲理性,颇富审美意义。挪威乃至北欧的历史时代和文学发展前景,需要易卜生的诗和剧,需要他的诗中剧和剧中诗,需要他的诗化人学和人化诗学。

关键词:美在纯真 主观抒情 易卜生 诗歌

作者简介:王忠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名誉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

Title: The Ly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bsen's Poems

Abstract: The Ibsen's creation path is similar to Shakespeare's, both moving towards a great dramatist from the lyrical poet. His early lyrical poems as well as his verse plays, all display the poet's remarkable poetic talent. Even his prose plays in his later period have many magnificent lines of strong lyrical flavor. Ibsen used each of his plays, each of his poems including the poems in the plays, to faithfully record his observations of social life and to reflect the fragments of his changing thought. His poetry contains strong historical feeling and philosophical quality, which are quite rich in aesthe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rwegian and Northern European Literature, whether in the past or in the future, Ibsen's plays and poems, his poems in plays and plays in poems, and his poeti-

cized humanity and humanized poetics are always necessary.

Key word: beauty in innocence subjective lyricism Henrik Ibsen
Poems

Author : Wang Zhongxia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onorary chief editor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d honorary director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Academic Society.

亨利克·易卜生生活与创作在 19 世纪下半叶挪威激进的变革时代,他的丰富的诗歌、戏剧、书信、文艺论文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代文化巨人,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一样,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①易卜生走过了从民族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艺术大师”的创作道路,他的诗歌所蕴含的历史感与哲理性,颇富审美意义。易卜生的诗歌美在纯真,是对世界的主观抒情。诗人易卜生和戏剧大师易卜生是统一的整体。

一、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

莎士比亚是诗人、戏剧家,在创作道路上总的趋向是从抒情诗人到剧作家,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叙事诗)均在早期创作阶段问世,甚至有些诗作与剧作同步进行。易卜生大体上也是如此,他的早期(1868 年前)诗歌和戏剧同时表现了民族浪漫主义精神;即使是戏剧,从诗剧《凯蒂琳》到《培尔·金特》,也表现了诗人卓越的诗才。不过,易卜生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较之莎士比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他到中后期不再专心写作诗剧,转而采用散文剧形式进行创作。丹麦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非常欣赏易卜生的早期诗作,因而衷心惋惜诗人易卜生的创作向散文剧倾斜时,“杀害了诗神缪斯的一只飞马”。^②勃兰兑斯虽然没有贬低易卜生戏剧品格的意思,但他关于作家诗才凝聚力在散文剧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意英国当代评论家布莱德鲁克的论断,易卜生创作中后期散文剧中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意识,还有表现技艺,可在他 50-60 年代的诗作

中找到“预示”，两者之间不无关系。在易卜生精选的《诗集》（杂诗，1871）里，这种关系是可以辨认出来的。^③理所当然，易卜生的诗剧与他的诗歌创作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诗剧《布朗德》（1866）的“前身”，就是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结合体（“史诗”）《布朗德》。它由《致与我同罪者》、《进入中年》、《越过高山》、《教堂之路》和《教堂》组成。1871年以后，易卜生并未断绝诗作，《北方的信号》（1872）、《四行诗》（1877）、《奈布莱的星辰》（1886）等，都是后来的扣人心弦的好诗。尤其是《奈布莱的星辰》，感情深厚质朴，韵律柔和回旋，光彩庄严璀璨，可说是体现了易卜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在戏剧体诗《布朗德》、《培尔·金特》之后，易卜生的散文剧作也不乏瑰丽、动人、隽永的诗行。比如，哲学历史剧《皇帝与加利利人》，多次出现了深化人物和剧情的“赞美诗”与“歌词”。在最后的剧本，即三幕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里，雕塑家鲁贝克的妻子梅遏曾三次吟唱她所写的一首小诗，讴歌她结束了“牢狱生活”，“象飞鸟一样地自由”，抒情色彩鲜明。在这一类戏剧中，有些人物交谈话语，虽未采用诗的分行，却充分表现了诗的对话的魅力和浓郁的抒情性。《玩偶之家》中娜拉与林丹太太关于“往事回溯”的对话，娜拉与海尔茂关于“奇迹”的对话；还有《建筑师》中希尔达与瑞格纳关于索尔尼斯登上“最高峰”的对话，都可作为有力的例证。在“对话”中，娜拉向林丹太太讲述自己的“秘密”（冒名借债为丈夫治病）之后，庆幸“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的那一段形容“前景”的话语，充满了诗情画意：“大好的春光快来了，一片长空，万里碧云，那该多美呀！”娜拉对海尔茂打开心扉的那一番话（从等待“奇迹”到“奇迹”破灭而决定出走），颇有散文诗的意味。在“对话”中，希尔达关于索尔尼斯的一些评语，如“我的可爱的、十分可爱的城堡！咱们的空中楼阁！”“……他究竟爬到了顶上，我还听见空中弹竖琴的琴声呢……。我的——我的建筑师！”这些诗的语言、诗的激情含蓄着深刻的人类追求高超而历尽艰险的哲理。这里的举隅，如前所述，与易卜生在早期创作的抒情诗、哲理诗、“组诗”是彼此呼应的。

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易卜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里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易卜生步入诗坛的时代“契机”,一是易卜生从事文学创作(诗与剧)以挪威乃至北欧文学发展为背景,而两者的关系又是非常密切的。先说前者。易卜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大约开始于1850年左右,结束于两个世纪嬗递的年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他的第一个剧本《凯蒂琳》写于1848-1849年,1850年自费出版。在这个无韵诗体三幕剧问世之前,他还写过一些抒情诗。易卜生特别珍惜早期的诗作与剧中诗,常常白称为诗人,以诗人称号为荣。在1874年9月10日对挪威大学生的讲话中,易卜生饶有兴味地讲及《绒鸭》、《记忆的力量》等诗歌,强调艺术创作(包括作家中后期的散文剧)“存在看事物的本领中,——要看的東西恰如诗人本人看到的那样传到接受者那里。”他号召大学生们像诗人一样敏感,关心时代精神主题:“大学生们事实上面临着诗人同样的任务;为自己并且通过自己为别人弄清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感到激动的、暂时的和永恒的问题”(222-223)。一般认为,易卜生的诗歌创作正式发端于1847年,最早一首诗歌题名为《断念》。当时(40年代后期),他还是格利姆斯达一家药房的学徒,工作之余努力学习文学,尝试诗歌与戏剧创作。早期的抒情诗与剧中诗,表达了年轻诗人的主观感受及其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虽有些悲观却不曾屈从“命运”。在《凯蒂琳》一剧中,易卜生通过剧中诗表达了如此奋发的精神:“我立下志愿,立下志愿,/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催促我前进,/我将听从它的召唤。”毫无疑问,这里更重要的是诗人的诗情经过挪威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民主革命运动的激发,迅速高涨昂扬起来。1875年,易卜生在《凯蒂琳》第二版的“作者序”中讲过自己早期诗歌产生于“不安定的时代”。1848年2月法国巴黎人民起义、1848年3月匈牙利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奥地利统治的革命斗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等,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面对这些重大的内外政治事件,青年诗人“总抑制不住自己热情充沛奔放的诗兴”,他写了许多“响亮的诗歌”,鼓舞匈牙利主要民族马扎尔人争自由、“反暴君”的正义斗争,还有针砭时弊的“相当数量的十四行诗”,“不少短小的警句”和辛辣的讽刺诗。诗人直率地说:“总而言之,在伟大的斗争正在外部激烈进行的

时候,我自己因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完全处于交战状态之中。”^①现在说后者,易卜生的诗作与剧作的诞生和创新,为挪威文学、北欧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另一视角考虑,易卜生的文学创作(诗与剧),适应了挪威文学与北欧文学发展现状。甚至可以说,挪威乃至北欧的历史时代和文学发展的前景,需要易卜生式的诗与剧,需要他的诗中剧与剧中诗,需要他的诗化人学和人化诗学。^②英国著名的剧评家、翻译家威廉·阿契尔认为,诗人易卜生与剧作家易卜生同等重要而伟大,他之所以翻译易卜生作品,不仅由于易卜生“是不同类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而且由于他“是个纯真的诗人”(《易卜生集》序)。

二、诗作中的历史性与哲理性

文学是人学,人的历史感与哲学思想意识都会在创作中通过不同的话语与形象表现出来。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早期抒情诗和诗剧,莫不如此。易卜生把他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连同剧中诗),当作自己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的实录,当作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片断。他说过:“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身体验的,也是与我阅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我来说,每次新的创作,都服务于心灵的解脱过程和净化过程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易卜生讲出了原因,这就是人处在社会中,不能不“共同承担责任”,为此,他以下列诗行作为“座右铭”:

生活就是——同心中的
魔鬼作殊死战。
写诗就是——对自己的
灵魂进行审判。(易卜生 52)^③

易卜生还说过:“……我体验到并随后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的是什么呢?……那么说吧,是高耸于日常生活中的‘我’之上的事物”(指生活中的“美好之花”照亮了他心灵的事物),同时他又承认,他也再现

了与此相反的东西(指内心精神视野中某种类似观察者心灵深处的“湮灭和沉淀”)。无论前者和后者,都是为体验生活的历史、心灵的解脱与新生。^③在这里,易卜生强调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生哲理性。易卜生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仍在强调他的文学创作与挪威历史的密切关系,与哲学意识的密切关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一位德国朋友:“谁要想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那雄伟而严峻的北方自然环境,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农场之间相隔几英里之遥——迫使他们只能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变得内向和严肃,忧郁而怀疑,并且往往丧失信仰的原因。但人们又都是哲学家!在那里一旦漫长、黑暗的冬天降临就会使房屋终日被浓雾笼罩。啊,他们是多么渴望太阳!”^④易卜生的诗与剧,就是挪威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其中诗人易卜生形象就是“人们”、“他们”的代表。与戏剧类似,易卜生的诗作也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⑤

易卜生的抒情诗(包括剧中诗)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趋向,探索了什么样的人生哲理,必须在具体作品的解读中获取“答案”。上文已提及,易卜生年少时就立志运用敏捷的诗才,经过艰苦奋斗,去震破黑暗的氛围;他要把“灵魂深处的微光”,化为一道“炫目的闪电”,刺穿那“死寂的黑夜”(《断念》)。1848年的欧洲人民革命风暴催生的诗作,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诗才,除了已知的《给马扎尔人》等诗,还有积极支持丹麦人反抗普鲁士侵略的十四行诗《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到60年代,普奥联军再次进攻丹麦,挪威统治者不出兵援助,结果丹麦惨败,这件事激起诗人极大的义愤。在《危难的兄弟》一诗中,诗人代丹麦兄弟向挪威人呼吁:

我的兄弟,你在哪里?
我在为北欧而血战;
我的国土已成为墓地;
我向着海峡沿岸眺望

却看不见你战舰的行迹。(易卜生 115)

诗人敦促挪威人“猛醒”，走上前线援助“危在旦夕”的兄弟。诗人从历史的视角，转向未来的远景：

历史应该如此疾书：

丹麦的狄拉草原属于丹麦。

国旗那被撕碎的一角

在北欧富饶的未来

将再度飘扬，舒展开红色的印褶！（易卜生 115-116）

在这首诗中，诗人告诫挪威人（主要是当权者）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必须支持丹麦兄弟抗击强暴势力，不要奉行“活命哲学”而“躲躲藏藏”。诗人的如此历史感、使命感是强烈的、持久的。直到 1872 年，诗人还在《北方的信号》中念念不忘死难的“丹麦的勇士”。诗人辛辣地讽刺为“和谈”争论不休的维也纳的外交官，深切地悼念流血牺牲的丹麦士兵，愤怒地谴责“黑色雄鹰”（德军）。在诗的结尾，诗人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转机即将来临，请继续说教！/那已经改变了方向的风标。”（易卜生 121）在诗人心目中，谁忘记了惨痛的历史，谁就是民族的罪人！诗人笃信战斗的哲学，这一特色早已在 60 年代初问世的《泰尔耶·维根》一类诗作中表现出来了。《泰尔耶·维根》的民族历史感与哲理含蕴也很突出，发人深思。全诗 43 节，叙述老渔夫泰尔耶·维根热爱自由、失去自由、重获自由的传奇故事。他与那横行在挪威海面上的英国军舰抗争，“不想用自己的悲伤去安慰自己的敌人”。他原来很想惩罚海上遇难的英国快艇，像英国勋爵过去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勋爵及其家属：“你夺走了我的生活！”“你是我全家死亡的罪魁！现在我要和你算帐，我的时候终于来到！”不过，他不像当年勋爵那么残酷，他看见这个不列颠人浑身瘫软，万分惊骇，头发变白时，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让这艘快艇和艇上的人获救。这一长诗的民族历史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无须赘言。它的哲理很耐人品味，这充分

表现在老渔夫的言行和心灵之中。在诗人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不是冲突,而是和谐。人生最宝贵的不是权与利的束缚,而是形体与心灵的自由。泰尔耶·维根认为自己援助勋爵及其一家人脱险也是为了自己。因为勋爵及其一家遇难和“转危为安”引发自己的人的信念(人性)复活。他简洁而平静地说:“很难说是谁的手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把你和我挽救。”他满意地宣称:“我失去了一切,一切又回到我的身边。”(易卜生 152-159)这就是人身自由,精神自由!泰尔耶·维根如此执着地追求精神反叛与自由,在日后易卜生剧中人物里进一步发展。诗人在诗作中所强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最终的和谐,当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泰尔耶·维根的经历,就是如此。

易卜生的抒情诗、叙事诗、剧中诗内容浓缩凝炼,形式手法多样。有的热情洋溢,放浪不羁;有的质朴纯真,情感凝聚;有的嬉笑怒骂,直言不讳;有的含蕴深邃,韵律回旋。无论哪一类诗作,总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真实与诗人心灵的真实。诗人反对社会生活停滞,追求自我精神解放,探索人类生存哲理,这些组合为创作的动力。在诗人的大量的诗作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画面交替出现,甚至同时展示。在 50、60 年代的诗歌与剧中诗里,诗人连续运用浪漫主义笔法勾勒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发抒由于现实生活而引起的内心郁闷和哀思。《矿工》中凿石开路、寻求安宁的矿工,《林肯被刺》中倒下去的人、一个男子汉,《记忆的力量》中失去自由、受尽苦难的熊,《绒鸭》(一译《棉凫》)中一次又一次被劫掠、向南飞逃的绒鸭(在原诗稿中绒鸭筑巢不成,终于死去),《焚烧的船》中扑溯迷离、引人思乡的船,这些人、物、事件无不联系着挪威的历史时代与诗人的哲学沉思。《在高原》(1859-1860)表现了关于“人往高处走”的精神境界与哲理思考。诗中的青年人(“我”)获得一个姑娘的爱情时,听从一个陌生人的劝告上山居住,经过夏天、冬天和来年的春天,延误了迎娶新娘的时间,又一个夏天,这个美丽的姑娘嫁给别人了。他抛弃了家乡、老母和未婚妻,抛弃了往日的岁月、痛苦和梦想,走自己“真正的路”,向上、向上、永远向上!他自豪地向天地敞开心扉: